

抗日战争中的河南大学(上)

河南大学建校于1912年,以林伯襄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河南教育家,在清代开封国家贡院旧址创办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,成为当时中国的三大留学培训基地之一,与当时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(今清华大学)和上海南洋公学呈三足鼎立的局面。后改建为中州大学、中山大学,至1930年改为河南大学,抗战前夕有文、理、法、农、医五个学院,在校学生1000余人。它是我国建校较早的高等学校之一,也是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一所大学。1937年12月,日寇的铁蹄已践踏到黄河流域,豫北、豫东沦陷,省城开封危在旦夕。值此危急存亡之际,河南大学撤离开封,虽辗转搬迁,但始终坚持在极其艰难条件下办学,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。



《一所流动大学的抗战》纪录片剧照(资料图)

躲避日寇流动办学

“1938年初,河南大学农学院和医学院首批迁往豫西镇平,文学院、理学院、法学院及校本部迁往鸡公山。”河大校史馆副馆长、副研究员刘建民说,“从此,河南大学开始了长达8年的流亡生活。这次搬迁是在校长刘季洪的主持下进行的。学校先将学生集中起来接受战时训练,然后才开始分批起程。凡能带走的图书与贵重仪器均精心包装,分批运走。不能搬迁的固定资产如房屋、设备和实验用具等均登记造册并派专人留校守护。抗战8年,河南大学搬迁5次(鸡公山、镇平、嵩县、潭头、荆紫关、陕西宝鸡,医学院则多次由荆紫关到汉中,又到宝鸡)在嵩县潭头5年,其他地方多则一年,少则数月。不仅办学条件十

分艰苦,而且师生还遭受日寇的疯狂迫害和残杀,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是罕见的。”

鸡公山是全国闻名的避暑胜地,新式楼房较多。河南大学迁去时正值隆冬季节,大部分房屋无人居住,学校便租来使用,很快安顿下来。不久,豫南战事紧张,河南大学准备再次搬迁。经多次商议,学校决定迁往豫西山区。这样既可避开日寇,又不脱离省境。

1938年10月,王广庆接任校长。他首先将留在鸡公山的文、理、法学院迁到镇平,以期在镇平安定扩充。镇平为豫西南重镇,社会文化安定,民风淳朴。河南大学迁至镇平后,借用部分官舍、寺庙,又租赁了一部分民房坚持上课。

由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,日军得寸进尺。1939年5月,日寇进攻新野、唐河,镇平危急。河南大学又北越伏牛山,经方城、叶县、宝丰、临汝、伊阳、伊川抵达嵩县,行程600余里。医学院迁到嵩县城内,校本部及文、理、农三院均到潭头。嵩县与潭头相距百里,途中高峰耸峙,深涧幽谷,羊肠小道,行走困难,校内联系极为不便,但师生不畏艰辛,坚持教学。迁到嵩县、潭头的师生共1100余人,借民房居住,为保证教学需要,又兴建一批草房。在潭头设总图书馆,各院又设分馆,计有中外文书7万多册,杂志200多种,还有各种仪器3.1万多件。农学院租得农作物试验场地30亩,棉作及园艺试验

场地各10亩,又与小学合作开办苗圃,并接管山地千亩,栽种果树和作造林之用。由于潭头为盆地,周围是高山,农林园作物齐全,本身就是一个大试验场地,师生们利用这一良好条件,努力开展教学与科研。医学院初迁嵩县时,有附设医院和高级助产职业学校。这年冬,又添设春季班及高级护士职业学校,并于次年3月招生上课。

无论在嵩县还是在潭头,都是在秋季正式上课,以不影响学生的学习,而且读书风气更浓。朝日初升时,山坡上,房舍内;夜晚时,盏盏油灯之下,师生们备课、读书,孜孜不倦。1939年5月至1944年4月,河大师生同仇敌忾,战胜万难,在嵩县潭头度过了五个春秋。

好景不长危险来临

1942年3月10日,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将省立河南大学改为国立河南大学,河南大学办学经费紧张的危难状况得以缓解,拥有文、理、工、农、医、法六大学院,成为当时享誉国内外的国立大学。

“1944年4月,日军集中兵力进攻河南,国民党军汤恩伯部不战而退,将敌军引到伏

牛山中,潭头危急。”刘建民沉痛地说,“全校图书仪器及师生衣物损失惨重,特别是师生及眷属10人竟惨遭屠杀。医学院院长张静吾教授被俘,夫人被害,侄儿张宏中受重伤。女生李先识、李先觉,教师吴鹏、商绍汤等均死于此难。农学院院长王直青教授被迫当挑夫,中途跳崖,幸被树枝挡住,重伤生还。这是日

本帝国主义欠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!”

1944年初夏,河大迁入嵩县已经5年,其间坚持在炮声中办学,每年都有毕业生走出大山,又有新生来到这里学习。最重要的是河大广邀教授,拥有几十位海归博士,人才济济,学术力量雄厚。在潭头期间,嵩县山区给了个好环境,使河大能够安静于此“藏学”,培养了五届毕业生。但

好景不长,令人悲愤的大屠杀悄然来临!

1944年5月9日,潭头镇麦田一片金黄,布谷鸟欢快地鸣叫,渲染着丰收的喜悦。但日军正在逼近,危险来临了。

河大师生虽在深山,但已感到了危险。在随即召开的会议上,化学系负责人李俊甫、文学院院长嵇文甫都主张尽快撤离。

潭头危急紧急撤离

1944年5月12日晨,师生们分路撤退,约定到25公里外的大清沟(在今栾川境内)会合。但还是有一些教师家属和学生未能及时撤走,突降的大雨和山洪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

当时医学院有个学生名叫李广溥,头一天才从嵩县县城转移到潭头。他后来回忆:“12日一大早,就看见汤恩伯部溃兵从门前经

过,询问前线战况如何,他们都低头不语,只顾向深山奔逃,看其狼狽相,就知前方战事不妙。我们到达伊河岸边时,已听到日军大炮的轰隆声。涉水过伊河后,大家避开正路,专走羊肠小道,以免被日军追上。我背着一个大包袱,还要推着自行车,在乱石丛中行走,行动非常困难。傍晚,我们一行人到达大清沟,借宿农舍棚檐下。当晚开始下大雨,一连三天不

停。多亏农学院农学系学生李德瀛家(是当地大户)开仓放粮,大家才免受饥饿。天晴后我们离开大清沟,进入山高林密重峦叠嶂的伏牛山腹地,往淅川县荆紫关前进……”

荆紫关山高林密,地处豫、鄂、陕三省交界处,利于藏身和办学。但这种长途跋涉,真难为了教授们,他们都花钱雇挑夫挑着行李和书籍。外科教授生景清的夫人(高级助产士

职业学校教师),坐在河边一块大石头上号啕大哭,原因是挑夫扔掉她的行李自顾逃命去了。他们一路上不时和国军溃兵走在一起,溃兵们都吊儿郎当的,根本没有战斗力,往往正在行进时,忽然两边山头上有人持枪高喊:“站住!”这些溃兵都乖乖缴械,以求保命。汤恩伯部大量的枪械和辐重,就这样被豫西百姓收缴了。

血泪斑斑罄竹难书

虽然1000多名师生已经撤出来了,但失踪的师生说不定已落敌手,生死难测。

那么,失踪的师生到底在哪里?李广溥曾有记述:“5月15日9时,数百名日军分两路侵入潭头,尚未撤离的师生四散躲避,但为时已晚。此时大雨倾盆山洪暴发,师生们不知该逃往何处,部分教师家属和数十名学生盲目地向北山转移,恰与一股日军骑兵遭遇,日军开枪,致使6人弹身身亡,20余人被俘。”

5月16日,潭头河大校园变成了日军兵营。这时,原农学院院长郝象吾已担任训导处处长,农学院院长是王直青。王院长和段再丕教授等20名师生被俘后,被鬼子兵用枪押着

做苦役,段再丕和助教吴鹏各背着一架经纬仪。为保护学校教学仪器,吴鹏与一名日本兵厮打起来,立刻被杀害。石如琰同学遭日军毒打,倒在地上。段再丕被迫挑上担子,王院长身背5支卸掉枪栓的钢枪,双手各提一篮鸡蛋。两位大学教授,多次遭到日军的毒打。行至秋扒(在今栾川境内),王院长决心一死,纵身跳下山崖,日军连发两枪,以为他已摔死,就离开了。

次日,王院长被潭头附近一青年发现,将他背到安全地带。挑着担子的段再丕起先尚能勉强走路,后来鞋子磨烂了,无法再穿鞋。行至一村附近,他要求方便。一名日军让他去路旁的麦地,说完便继续往前走。段再丕乘

机爬到一姓常的农民家里,在那里休息了两天,得知该村已是卢氏县所辖了。

被俘的教授尚如此,学生的命运更惨。李先识、李先觉是对双胞胎,同年考入河大医学院,姐姐李先识已婚,妹妹李先觉未婚,两人品学兼优,活泼开朗。5月15日晨,她俩听到四周枪声大作,还有日军飞机投下炸弹。一队日军骑兵冲进校院,仪器室、标本室的门被砸开,教学用具被泼上汽油烧掉。

天下了大雨,医学院的几个女学生在前边奔逃,几十名日军在后边追赶着喊:“不要跑!花姑娘的不要跑!”一日军搂住一女学生,那个女生拼命反抗……最终,几名女生被

日军追上,被押着往前走,日军不时地用枪托打学生,还对女生动手动脚。

姊妹俩感到屈辱,李先觉说:“姐,我们落到日本人手里,生不如死!”李先识说:“就是!你看前面有口水井,咱俩一起跳井,也好让同学看到,捎话给咱家中二老,知道我们死在潭头!”妹妹说:“宁可死,不受辱!跳!”说着说着,姊妹俩来到井旁,双双跳入井中。鬼子发现了,过来向井内开枪。这时,男生朱绍先(或称朱绍良)趁机狂奔而去,被一日本兵赶上,一刺刀将他捅倒,肠子都流了出来。几天后,附近农民过来掩埋了他的尸体,在坟头插一木牌:河大学生朱绍先之墓。该墓至今犹存。(据《河南法制报》)